

陈述先生与史语所

张峰

陈述虽于1940年离开了史语所,但他始终与史语所保持着联系,认为自己只是从史语所请假至东北大学,故而后来屡次请求返所。只因时局动荡,未能如愿。1948年出版的《史语所集刊》第20本下册刊发了陈述的《虬军考释初稿》一文。这是史语所为配合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,推出的一期“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专号”,刊发的文章多为史语所学人内稿,陈述之文刊载其中,折射出他与史语所“断而未断”的关系。

2018年1月,中华书局出版了陈述先生(1911—1992)遗著《辽史补注》。这部十卷本、240万字的史学名著,是陈述历时一个甲子的心血所萃。它的出版,弥补了《辽史》过于“简略”和“脱漏甚多”的缺陷,必将有力地推进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。然而追述此书编纂的缘起,则不能不从陈述与历史语言研究所(以下简称“史语所”)的关系说起。

在师大就读的四年,是陈述初识史学门径的重要时期。在这里,他得到名师指导,博览众籍,善学深思,学术才华逐渐施展,于是在同学之中脱颖而出。这一时期,他相继撰写了《陈范异同》《补南齐书艺文志》《金史氏族表》《蒋心余先生年谱》等论文,表现出广泛的学术兴趣。其中,《金史氏族表》一文,甚得陈垣欣赏,遂将它友朋中传阅。陈寅恪看过此文后,认为写的很好,作者年龄“起码四十”。陈垣告诉他,作者是自己的学生,“今年才二十出头”。于是陈寅恪说:“让他跟我见见面。”因此机缘,《金史氏族表》成为陈述结识陈寅恪的学术纽带。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,陈寅恪谈到了王国维,并对陈述说:“王观察是中外闻名的大学者。他的兴趣经常转换。如果他不换,成就就会更大。”陈述事后体会陈寅恪说此话的用意在于教导他“做学问要专一”。(参见《陈述先生忆往事》,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1992年第3期)检视陈述在大学时期发表的4篇论文,涉猎多个时期的史学问题,然毕业之后则专攻辽金史,这种治学方向的转变应与陈寅恪的启示不无关系。

《金史氏族表》还在陈述与傅斯年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。此文经陈垣的推荐,引起了傅斯年的兴趣。傅氏在阅读陈文之后评价说:“陈述先生潜修成此一书,精勤可佩,坚实可欤。”“此书之充实,当以所参检文集、碑志之数量为准,而其优越,当以发见沿习之误为标。今初稿已坚实丰盈至此,后来必为金源一代史事研究作础柱矣。欣喜甚甚!”(陈智超编注: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[增订本],三联书店2010年版,第414页)于是傅氏将陈述之文分为上下两篇,发表于1935年出版的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五本第三分和第四分。《史语所集刊》是当时国内的权威期刊之一,在国际汉学界也享有一定的声誉。陈述以本科生的身份在上面发表学术论文,反映了傅斯年对他学术水平的认可。



20世纪30年代在中研院办公

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的初衷之一,是“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”,并认为“此实后来历史语言学在中国发达命脉所系,亦即此研究所设置之最要目的”。(《傅斯年全集》(六),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,第30页)傅氏慧眼识珠,对于陈述这样优秀的年轻学人,自然不会因其非北大毕业而将其拒之门外。在决定刊发《金史氏族表》不久,傅斯年便邀约陈述见面,约定让他毕业之后到史语所工作。就这样,陈述甫一毕业,便与北大史学系毕业的全汉昇、余逊同年进入了史语所。

在颠沛流离之中笔耕不辍

从1935年到1940年,陈述在史语所工作了五年半的时间。在这期间,日本侵华的步伐不断加快,史语所的发展因受时局影响而不断播迁。1935年11月,史语所历史组迁入南京北极阁新址,陈述亦随所南下。1937年8月,淞沪会战爆发,史语所开始迁往长沙,在长沙短暂停留两月之后,便决定再迁昆明。1938年3月,陈述刚刚抵达昆明,便与劳榘一起写信向傅斯年汇报了迁徙情况:“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,李启生、高晓梅诸君费力甚

大,梁先生尤卖气力,生等亦随同料理,不敢分一、三组畛域,亦不敢辞事物工作也。惟房屋至今无着落,故一切均未进行。”(《傅斯年档案》,II-455)然而,好景不长,随着滇边军事吃紧,昆明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,史语所不得不于1940年10月从昆明陆续迁往四川李庄。就在此时,金毓黻向史语所商借陈述到位于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,所以陈述未随史语所到达李庄,而是直接去了四川三台。由此观之,陈述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随着史语所由北平至南京,过长沙,到昆明,最终落户三台,生活大受影响。

可贵的是,陈述在颠沛流离之中依然笔耕不辍。于史语所任职期间,他先后在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发表了《阿保机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》《曳落河考释及相关诸问题》《头下考》《契丹世选考》《东都事略撰人王赏、称父子》5篇论文。这些论文的撰写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陈寅恪的指导。从陈寅恪书信集来看,他写给陈述的书信数量很大,共计22通。这些书信一是请求陈述等人代为寻书的短笺,一是对陈述治学的指导意见。譬如,针对陈述对曳落河相关问题的疑惑,陈寅恪在一封回信中写道:“曳落河最初为何民族语,尚待考。……尊著所定为契丹语之文献似较晚,能得时代更前者尤佳,但恐不易求也。”“禄山于契丹关系深切,不独孙

孝哲为其骁将也。”“曳落河在禄山前是否亦专名,即一种民族之名,而健儿之义转为后起,与赭羯同耶。”(《陈寅恪集·书信集》,三联书店2001年版,第181页)观照陈述发表的《曳落河考释及相关诸问题》一文,可知他在撰写“安禄山曳落河下落之臆测”一目时,采纳了陈寅恪的观点。故而,陈述在此文结尾处突出强调:“本文属稿,承陈寅恪先生驰书启海者再,几千数言。敦敦不厌烦琐。”(陈述:《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》,《史语所集刊》第七本第四分,1938年)

除以上5篇刊出论文之外,陈述在史语所任职时期还曾撰成《舍利横帐考释》一文,并且此文后来被编排在《史语所集刊》第十本第四分。然而,令人颇感意外的是,史语所档案中有一封傅斯年1943年6月3日写给贺师俊的信件,内容是告知贺氏将“《舍利横帐考释》抽出换入《讲史与咏史诗》”。(史语所档案,李9-3-17)《讲史与咏史诗》是史语所的张政烺所撰。傅斯年的这一做法,是否因为陈述已到东北大学任教,而此时处在抗战时期,出版困难,所以尽量优先刊发留在所内的同人著作?此中缘由,不得而知。在史语所的公文中还有一通那廉君写给陈述的信,主旨是询问陈述是否收到了寄还的《舍利横帐考释》一文。(史语所档案,李9-9-5)《舍利横帐考释》在陈述生前从未刊发,直至他去世之后,才刊于2000年5月出版的《燕京学报》新八期。

不惟论文的撰写、发表,陈述于史语所时期最值得称道的著作应是《辽文汇》。根据史语所1935年的工作报告记载,陈述参照“缪荃孙《辽文存》、王仁俊《辽文萃》、黄任恒《辽文补录》、罗福颐《辽文续拾》及新得之辽碑志若干种为《全辽文》之校订。”(《傅斯年全集》(六),第489页)后来,陈述考虑《全辽文》“极端形容之‘全’字,过为

陈述的史学成就之所以能够引起傅斯年的重视,应与他扎实的学术功底、敏锐的学术识见和陈垣的大力提携密切牵涉。1929年,他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和北平师范大学预科,由于他的父亲知道陈垣在北师大兼课,所以就让他选择了北师大预科就读(刘凤翥语)。1931年,陈述考入北师大史学系。